

論黃碧雲早期作品中的魯迅身影

丘庭傑*

摘要

黃碧雲的小說和專欄文章時有魯迅之身影，她本人也直認是「魯迅迷」，兩人的文學淵源，值得探究。早於千禧年已有論者提及黃氏作品中的魯迅身影，但迄今仍未有任何專文詳細討論這一點。魯迅作品具有眾多的向度，黃碧雲契接了哪些面向？兩人各自經歷中國近代歷史不同的重要時刻，在思考左翼、歷史、寫作等議題時，黃氏如何參考或呼應魯迅作品的思考？本文以黃碧雲 1993-1996 年間與魯迅相關的專欄文章，以及〈一念之地獄〉(1992)、〈失城〉(1993)、〈豐盛與悲哀〉(1994) 和〈江城子〉(1994) 四篇小說作為討論對象，嘗試整理和分析在該時期作品中反復出現的魯迅身影，以「寫作與真理」、「希望／絕望」、「歷史與個人」等面向切入，提出黃氏如何在文學乃至精神層面上與魯迅有所契合。

關鍵詞：黃碧雲、魯迅、影響研究、香港文學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The Shadow of Lu Xun in Early Works of Wong Bik Wan

Kevin Yau Ting Kit

Ph.D. Candidat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Wong Bik W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ng Kong contemporary writers. She admits herself as a “Lu Xun’s Fan”(魯迅迷), 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authors is therefore worth exploring. Some scholars mentioned their relationship in 2000. However, there is no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since then. How is Lu Xun received in Wong’s works? Lu Xun and Wong experienced different significant moments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how does Wong echo and response to Lu Xun in terms of Left-wing, historical and writing issues? This paper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Wong Bik Wa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ewspaper columns of Wong during 1993-1996, and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her novels *Hell in a Thought* (一念之地獄, 1992), *City Lost* (失城, 1993), *Abundant and Sorrow* (豐盛與悲哀, 1994) and *Jiang Cheng Zi* (江城子, 1994).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Lu Xun in these works according to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Writing and Reality”, “Hope/Despair” and “History and Individual”.

Keywords: Wong Bik Wan, Lu Xun, Impact study, Hong Kong Literature

論黃碧雲早期作品中的魯迅身影

丘庭傑

一、引言

黃碧雲早期作品與張愛玲的文學關係一直受學術界關注。¹有趣的現象是，黃碧雲不斷否認自己跟張愛玲的承傳關係，有意與之保持距離²，反之，她再三提起魯迅，甚至曾展示出一種近乎崇拜的態度。早在九十年代，她便已直認是「魯迅迷」³，又在專欄文章上密集地提到魯迅及其作品，直至近年出版《烈佬傳》(2012)她仍然說：「[書頁插圖]用木刻是因為魯迅。」⁴《微喜重行》(2014)又見〈影的告別〉、《阿Q

¹ 有關黃碧雲與「張派系譜」的討論，可參考以下論文，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收入劉紹銘等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7-18；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雲 vs. 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文學世紀》2(2000.5)，頁14-20；盧敏芝：〈論黃碧雲小說與張愛玲小說的文學關係〉，宣讀於「香港亞洲研究學會第八屆研討會」(香港：香港教育學院主辦，2013.3.8-9)。

² 黃碧雲：「當初我以為是那羣張愛玲迷的問題，後來想清楚，不是。是張愛玲的問題。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很精到。語言華麗。但卻是沒有心的小說。我以為好的文學作品，有一種人文情懷：那是對人類命運的拷問與同情：既是智性亦是動人的。這種同情，用佛家語言，就是慈悲；用基督教語言，就是尋求救贖。因為慈悲與救贖，我們就有了力量，並且感到美。張愛玲的小說是屬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好像一個飽受什麼命運蹂躪的老女子，喃喃的在黑暗房間在數錢，一邊在埋怨自己命運坎坷，一邊喃着要將窮租客趕走，租客已經什麼錢都沒有，又病，又有孩子，好麻煩，沒錢就睡街，不要租她的房子。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撇開黃碧雲在接受張愛玲的時候有否主觀或偏差的問題，這段話大概可視為黃碧雲決意與張愛玲劃清界線的「宣言」。見氏著：〈過譽〉，《明報周刊》，「『暫且』專欄」，1999年4月10日。

³ 黃碧雲：〈為了忘卻的紀念〉，《星島日報》C4，「『七好文集』專欄」，1994年2月3日。

⁴ 「用木刻是因為魯迅。木刻是農民的手藝，粗糙原始。《烈佬傳》很粗。」黃碧雲受訪問，周眠撰文：〈黃碧雲：灣仔烈佬有話說〉，《明報·世紀版》，2012年8月16日。《烈佬傳》在「此處」、「那處」和「彼處」三部份的開首書頁用上了木刻畫作插畫，見黃碧雲：《烈佬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5、55、123。

正傳》等魯迅足跡⁵，可見黃碧雲受魯迅影響之深。

早在千禧年前後，黃念欣和危令敦兩位學者已分別注意到黃氏小說中的魯迅身影。⁶雖然兩篇論文都未有就黃碧雲跟魯迅的文學關係作出詳細的分析和討論，但二人均在論文末段點明「魯迅」，此舉大概不是偶然，乃是對於這個有待探索的議題方向劃下記號，並寄寓了「留待後人來」的用心。然而，十餘年來一直未見有論者延續討論，直至 2016 年初學者凌逾在討論《烈佬傳》時再次觸及這個議題，〈重構中西文化因數——從非虛構的虛構看文學大勢：論《烈佬傳》〉其中一節就《阿 Q 正傳》和《烈佬傳》提出了對照的方式。⁷由於迄今仍未有專文詳細討論，有關魯迅與黃碧雲的文學關係，目前仍有很多空白處。例如魯迅作品具有眾多的向度，黃碧雲契接了哪些面向？兩人各自經歷中國近代歷史不同的重要時刻，在思考左翼、歷史、寫作等議題時，黃氏如何參考或呼應魯迅作品的思考？本文以黃碧雲 1993-1996 年間與魯迅相關的專欄文章，以及〈一念之地獄〉（1992）、〈失城〉（1993）、〈豐盛與悲哀〉（1994）和〈江城子〉（1994）四篇小說作為討論對象，嘗試整理和分析在該時期作品中反復出現的魯迅身影，又以「寫作與真理」、「希望／絕望」、「歷史與個人」等面向切入，提出黃氏如何在文學乃至精神層面上與魯迅有所契合。

本文首先從黃碧雲九十年代中期的專欄文章出發，鉤沉箇中未為人關注的線索，提出魯迅作為研究黃碧雲文學淵源的重要座標之一，其影響不容忽視。接著，本文會處理她的四篇小說。當中〈一念之地獄〉發表年份最早，在 1992 年 12 月刊登於《星島日報》「文藝氣象」專欄，其次發表的是〈失城〉，1993 年 1 月刊登於《越界》雜誌，兩者相隔一個多月。〈豐盛與悲哀〉和〈江城子〉的發表時間分別為 1994 年的 1 月（《君子》雜誌）和 8 月（《號外》雜誌），與前兩篇小說相隔整整一年。這四

⁵ 黃碧雲：《微喜重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頁 321。

⁶ 黃念欣：《黃碧雲小說中的「暴力美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哲學碩士論文，2000）；危令敦：〈血紅的無人之境——試論黃碧雲的「溫柔與暴烈」〉，《中外文學》28：10（2000.3），頁 162-184。

⁷ 凌逾一文採用的研究方法是比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與本文有所不同。凌逾：〈重構中西文化因數——從非虛構的虛構看文學大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016.8），頁 161-166；亦收入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編：《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黃碧雲《烈佬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頁 111-128。

篇作品在思考議題上具有一致的方向，且展示了作家發掘愈深的足跡。〈一念之地獄〉混合小說與雜感，頗見作家其時強烈而零碎的情感與思緒，這些有關「希望」、「歷史」、「寫作」的思考隨時間而蘊釀，直至後來的〈豐盛與悲哀〉和〈江城子〉在藝術性與思想性均展示出新的高度，黃碧雲採用較為完整的敘事結構鋪陳歷史，更深刻地討論以上議題。因此，本文根據四篇小說之發表時序為主軸，逐一討論當中與魯迅相關之處。又為使各節焦點集中，本文在分析各篇小說時將選取特定面向為重心，其他面向的論述為次：〈一念之地獄〉部份著重「寫作與真理」，〈失城〉部份著重「希望／絕望」之辯證關係，〈豐盛與悲哀〉與〈江城子〉部份則偏重於「歷史與個人」。

二、專欄文章中的魯迅身影

黃碧雲在專欄文章中曾多次提及魯迅，最密集的時段為 1993 至 1996 年間，按筆者統計，《明報周刊》「其後」專欄上與魯迅相關的文章起碼有 14 篇，其中 7 篇集中於 1993 年 12 月至 1994 年 4 月期間，同期於本文所討論的四篇小說。以下試圖分別以「談魯迅」和「模仿魯迅」兩方面呈現其面貌。

黃碧雲在專欄談魯迅，多半是借魯迅的觀點或言論來批判社會。⁸〈悲哀的靜默表演〉批判的是社會上的看客、庸眾：「或者真如魯迅所說，在中國連搬動一張桌子這麼一點小改革都要流血。而抱著雙手看這些靜默表演者的觀眾，不得不落得為虛無主義者，夜來靜思，還會寂寞，和悲哀。」⁹〈突如其來的，殘酷的，覺醒〉借魯迅「幻燈片事件」來談中國反覆的沉睡與覺醒，又用到「悲涼」一詞形容魯迅¹⁰，〈文明無血〉記述魯迅大半個世紀前批判中國人的飲食「野蠻」，從而對社會現況作出批

⁸ 黃碧雲也有少量文章是借用魯迅作品篇名或沿用句子，但實質內容與原作關係不大。例如〈野草〉雖用魯迅散文詩集《野草》之名，又以〈影的告別〉前幾句為開首，但下文與原作關係不大。見黃碧雲：〈野草〉，《明報周刊》，1994 年 3 月 27 日。

⁹ 黃碧雲：〈悲哀的靜默表演〉，《明報周刊》，1993 年 12 月 5 日。

¹⁰ 黃碧雲：〈突如其來的，殘酷的，覺醒〉，《明報周刊》，1994 年 1 月 30 日。

判¹¹，〈給魏京生〉在談論異見人士魏京生時，便即聯想到魯迅，文章抄錄了魯迅為柔石寫的舊詩，並寫道：「魯迅於其戰友柔石遇害後寫了這首詩。過了兩年，魯迅才能在平靜中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柔石及其他青年的犧牲。因其緩慢長久，見其痛且深。」¹²昔日魯迅到香港青年會演講，講題是「無聲的中國」，勸告青年將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¹³；黃碧雲〈港罵〉卻將此詞重新演繹：「魯迅痛罵無聲的中國，我卻追求無聲的中國；並非沉默畏縮，而是有這樣的文化水平作理性討論的中國，自然安靜無躁。」¹⁴〈孔乙己〉則借一則有關偷書的新聞作文章，以「孔乙己」指代偷書賊，慨嘆讀書時代的失落。¹⁵從以上例子可見，魯迅的社會批判是黃碧雲在生活中思考社會問題的重要參照點，同時也成為了她議論社會問題時的資源。

黃碧雲在談魯迅的時候，也有談及自己的寫作和閱讀經驗。〈遊園驚夢〉提及自己寫作時的心境是「絕望」和「虛妄」¹⁶，這點顯然與魯迅相似。至於黃碧雲對魯迅的閱讀，許多時與解困有關。黃碧雲的思維模式與魯迅頗有相似之處，她在小說中反覆辯證而不輕易滿足於普通答案這一點，與魯迅的多疑思維是一致的。加上她在當時擔任記者，對於社會事件份外掛心，這導致了她經常處於非常困惑不安的狀況。黃碧雲無疑通過魯迅作品找到心靈上的知己，她在另一篇刊登在《星島日報》的專欄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就說：「我是魯迅迷，不單因其寫作，也因其忍受痛苦的能力……他強壯勇猛又是悲哀的，性格思想都非常複雜，可供反覆玩味。」¹⁷又

11 黃碧雲：〈文明無血〉，《明報周刊》，1994年2月27日。

12 黃碧雲：〈給魏京生〉，《明報周刊》，1995年12月24日。

13 魯迅：「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氏著：〈無聲的中國〉，收入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4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1-17。

14 黃碧雲：〈港罵〉，《明報周刊》，1996年6月9日。

15 黃碧雲：〈孔乙己〉，《明報周刊》，1996年12月8日。

16 「而我寫作——一樣絕望，一樣虛妄。」見黃碧雲：〈遊園驚夢〉，《明報周刊》，1996年9月29日。

17 文章共有九段，前八段皆引錄自《魯迅：其人，其事，其時代》一書，只有少許文字改動以求順暢，

在《明報》「暫且」專欄的〈後殖民小字典〉說：「我在讀魯迅，如臨危吃藥，以得片刻的支持……」。¹⁸她在這些文章中都毫不隱藏對魯迅的狂迷和熱愛，並在魯迅作品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另一篇文章〈朝花夕拾〉沿用魯迅集名，其中分享了自己的閱讀經驗：「魯迅的小說裡面，我最喜歡是寫於 1925 年 10 月 17 日的《孤獨者》。四天後他寫了晦暗的《傷逝》。兩個小說都寫得哀傷難言。」文章接下來以三百字篇幅簡述〈孤獨者〉整篇小說，又寫到自己讀後想到了「魯迅本人，老舍，傅雷夫婦，沈從文，其時代，其聲，其沉默，及其婉轉難言。」¹⁹以上資料都豐富我們對黃碧雲的認識，特別是她對魯迅以及五四作家的接受程度和接受來源。

至於「模仿魯迅」，本文試舉三篇為例。〈九七格〉：

我在讀顧城的《□□》和□□□的《廢都》，讀著讀著便非常的頭痛和憂心，因為讀來讀去都是□□和（下刪□□字），懷疑那是政治的□□，抑或是性的□□，到底將來□□之後，我們會否讀到□□的文字。²⁰

〈不要輕言 XX 和 XX〉：

動輒就不惜以 XX 和 XX 來保住 XX，是逃犯狂徒的歌斯底里症。……咬牙切齒，不惜 XX 和 XX，是「水滸傳」式的徒灑狗血，中世紀的浪漫情懷。²¹

這兩篇文章都採用刪字的形式來表達內容，前者談的就是言論不自由的情況，後者則談宏大字詞的濫用。這個技巧顯然取法自魯迅《偽自由書》，例如〈推背圖〉：

如近幾天報章上記載著的要聞罷：一，XX 軍在 XX 血戰，殺敵 XXXX 人。二，XX 談話：決不與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三，芳澤來華，據云係私人事件。四，共黨聯日，該偽中央已派幹部 XX 赴日接洽。五，XXXX……倘使都當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駭人了。但報上也有「莫千山

內容除了講述魯迅創作的背景，傾向強調魯迅的悲觀、寂寞的心理，最後一段為上述引文。黃碧雲：〈為了忘卻的紀念〉。又見一丁（樓國華）：《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香港：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

¹⁸ 黃碧雲：〈後殖民小字典〉，《明報周刊》，1994 年 2 月 6 日。

¹⁹ 黃碧雲：〈孤獨者〉，《明報周刊》，1996 年 10 月 13 日。

²⁰ 黃碧雲：〈九七格〉，《明報周刊》，1994 年 1 月 16 日。

²¹ 黃碧雲：〈不要輕言 XX 和 XX〉，《明報周刊》，1995 年 7 月 30 日。

路草棚船百餘隻大火」，「XXXX 廉價只有四天了」等大概無須「推背」的記載，於是乎我們就又胡塗起來。²²

〈九七格〉基本上就是對〈推背圖〉的一次仿作，而李歐梵在分析魯迅雜文時所言：「XX 是一種符號，也是一個空白，它迫使（或引誘）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停地『填空』」²³，這點於〈不要輕言 XX 和 XX〉在意念上也是一致的。

黃碧雲對「魯迅風格」的接受不只在於雜文，也見其散文詩。〈比重更重，比輕更輕〉：

過了很久很久我才明白過來。復原後，我會笑：「是麼，他們有靈魂麼。」我的靈魂亦迷失至不知所蹤：迷失至不知其迷失。……將幾個苦瘦的理想青年，在幻滅的荒漠之中，與我迷走不歸的靈魂相遇。

「你還未悟透麼。」他們喝問。

「理想是沒有的，靈魂也沒有。」他們說。

我的靈魂在那裡嗚嗚的哭了。²⁴

這裡虛擬作者與自己的靈魂相遇，並在一刻之間得到醒覺，最後靈魂便哭了。這段文字驅使我們在腦海中浮現極其熟悉的一些形象。荒漠上苦瘦的理想青年就像無止地前行的「求乞者」和「過客」，而與靈魂（自我）對望的情節則使人聯想到黑夜中前來告別的影（〈影的告別〉）、化為長蛇而自噬其身的游魂（〈墓碣文〉）乃至其餘六篇同樣以「我夢見自己……」開首的散文詩。不論是題材或文辭，〈比重更重，比輕更輕〉瀰漫著的就是《野草》當中奇詭的氣氛。

通過以上專欄文章，可見黃碧雲對魯迅的接受情況。據筆者所觀察，創作九十年代是黃碧雲受魯迅影響程度最直接、最明顯的時段，這種現象在她首部小說集《其後》（部份為八十年代末的作品，1991 年結集出版）未有出現，似乎是經歷過民族劫難以後，思想「碰壁」而觸發、促成的一種複雜的創作情懷，在 1992 年〈一念之

²² 魯迅：〈推背圖〉，《魯迅全集》第 5 冊，頁 97-99。

²³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二十一世紀》19（1993.10），頁 39-51。

²⁴ 黃碧雲：〈比重更重，比輕更輕〉，《明報周刊》，1995 年 9 月 10 日。

地獄〉始得展現。黃碧雲在 1997 年以後的作品不再以同樣的方式來呼應魯迅，直至近年的《烈佬傳》仍然「不捨」魯迅，似乎在繼承其人文關懷的同時作出了其他文藝上的嘗試，例如探求「小寫」、拒絕「宏大」的可能，這些都值得今後再仔細思慮，本文暫未得兼及處理。

三、〈一念之地獄〉：寫作以尋路

〈一念之地獄〉在過往較少得到論者注意，這或許是其藝術性的缺陷所致，包括結構較零散、敘事與抒懷文字夾雜，部份篇幅似雜感多於小說。然而，要討論接下三篇小說，則不得不從此入手。它既標誌著作家一連串思考的起點，也同時在這篇小說後記「其後」中提出了她的寫作宣言。以下嘗試撮述內容，並點出當中與接續作品相呼應的議題，繼而分析「其後」作為寫作宣言的意義。

〈一念之地獄〉分為「認罪還是不認罪」、「天堂與地獄」和「罪與罰」三部份，後附「其後」串連三者。「認罪還是不認罪」又開三節。第一節寫 1980 年澳洲留學的香港研究生陳路遠回中國大陸探訪工人運動份子，被逮捕兩年後才起訴間諜罪。小說討論人的軟弱與良心的詰問，陳路遠「一無所有，無所捍衛，除了自己的良心」²⁵，他的良心非常清晰，無罪可認，但最終還是敵不過人的一時軟弱，於是動手寫認罪書。陳路遠做過「阿 Q 式的『我是狗熊，是蟲豸』的認罪方式」後還是被判囚十年。放監後，他雖然被視為英雄，自己卻認為良心已不再清晰，是個「大近視」，再也看不清楚遠方和將來了。第二節是約二百字的雜感，開宗明義寫到內地異見份子劉曉波及其《末日倖存者的獨白》。²⁶

比對第一、二節，陳路遠表面上指代劉曉波，卻顯然有吳仲賢和劉山青的影

²⁵ 黃碧雲：《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 131。以下一律在內文以頁數標示。

²⁶ 劉曉波在 1989 年 4 月回中國參與學運，6 月 6 日被拘捕，在北京秦城監獄囚禁一年零八個月，期間曾在中國官方中央電視臺上作證未見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1991 年春季受審，判詞稱因劉氏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1992 年劉曉波在臺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對其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

子。²⁷所以，陳路遠不僅僅指代任何一人，乃泛指當時的異見人士。黃碧雲在這節直接抒懷：「如果劉之新作『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有值得一讀的地方，不在於『六四』或一個近代群眾運動的偉大，而在一個人的軟弱。」又言「明白軟弱，所以堅強。」（頁 134）這裡有關吳仲賢、六四事件，以及對於「軟弱」和「堅強」的思考，都在〈江城子〉再次處理到。第三節寫李小敬和林桂二人在文革中被批鬥，無論認罪與否結果也是被下放。結合「認罪與不認罪」三節，作家著力呈現的是歷史與個人的關係：「在巨大的歷史命運裡面，個人的主觀意志，完全沒有作用。」（頁 137）此一主題在後來發展成為〈豐盛與悲哀〉中的重要議題以及〈江城子〉中極為深刻的反詰。

「天堂與地獄」分為四節，寫得較為晦澀。第一、四節為同一故事，講述精神病患者趙眉「站在光明與黑暗的門檻之上」，軀體在精神病院的沙發上，心境卻以「全屋著了火」這個瘋狂的意象來描述；不論容忍抑或離開，「世界」與「我」都並不相容，作品借意探問人類應否適應世界而放棄真我。第二節為尼津斯基（Vatslav Nijinsky，或譯尼金斯基）的日記，第三節則提及尼采、托爾斯泰、龐德、慧雲李、尼津斯基、梵高、舒曼、巴爾札克等藝術家。「天堂與地獄」關注的是臨近甚或經已瘋狂的偉大藝術家如何面對自己內心的黑暗。整篇「天堂與地獄」就是一則「狂人」心跡錄，瘋狂的議題契接尼采、魯迅的思考。魯迅在《野草》裡展現了對內心黑暗一面的反抗與掙扎，而黃碧雲同樣把人物（以及自己）放置在「光明與黑暗」的門檻上，面對歷史的荒謬，苦困其中而無從解脫，用她的語言來說：「反反覆覆，活在地獄裡」（頁 150）。然而，這部份未有交代趙眉面對怎樣的現實世界和荒謬，藝術家乃至作者所承受的痛苦始終未有具體明確說明。直至後來的三篇小說，黃碧雲才將這種艱險困難、進退不容的人生境況鋪陳得清楚而具體。

至於「罪與罰」亦分為三節，內容圍繞執法與司法制度的討論，與本文所討論的關係不大，略去不表。〈一念之地獄〉以「其後」串連三個部份，用第三人稱「她」自白：

²⁷ 吳仲賢和劉山青於八十年代初先後回國內被捕，吳仲賢寫下了悔過書後馬上獲釋回港，而劉山青則未有寫悔過書，囚禁十年後才釋放返港。「認罪／不認罪」部份應以此二人為人物原型。

她只是非常的軟弱。容忍，還是離開？愛，抑或不愛？寫作，還是沉默？由於她對自身的軟弱進行嚴厲的思索，因此她明白了很多懸於一念的處境——認罪，還是不認罪。跨在光明與黑暗的門檻之上，回去，還是離開？然而存在並不斬釘截鐵。(頁 149-150)

「容忍／離開」、「愛／不愛」、「寫作／沉默」，黃碧雲把自己嚴厲地放置在眾多的二元對立之中，對良心之拷問近乎於自虐，對人文精神之渴求有若信徒之狂熱，這一點在同代香港作家筆下是罕見的，黃碧雲對魯迅乃至五四人文精神的承繼亦即在此。

「其後」最後的一段文字極為關鍵，不但談及其文學觀，亦回應了先行者對文學的呼聲：

寫作是為了追尋真理。這一點，作者和修士一樣要有獻身的精神。然而宗教的真理的道路愈來愈狹窄，最後到達了光明的十字架骷髏地山頂。作者的真理道路卻愈走愈廣闊，一一追尋真理的人慢慢會明白，原來根本無所謂真理。這樣一來，她便因為追求堅強，而變得軟弱了。(頁 150)

這裡採用「道路」的象徵來說明作者追求真理的過程，明顯具有魯迅的影子，卻展示出與魯迅不同的思考。魯迅早在 1919 年已提到「路」，〈生命的路〉：「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²⁸及後他在 1921 年發表的小說〈故鄉〉再次使用「路」的象徵：「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²⁹從「生命的路」到「希望正如地上的路」，其所指實有微妙的轉化，前者是生存下去的實際手段，後者提昇至抽象化的生命信念。當然，魯迅的「希望」並非獨立存在的，乃是與其「絕望」並存，這種複雜的辯證思考在 1924 年至 1927 年間更驅使他寫下《野草》集。這點將在〈失城〉的部份再作討論。

回到黃碧雲的「道路」，她同樣抽象化處理「路」的所指，然而此處不取「希望」而取寫作者追尋的「真理」，份外體現出中國寫實主義的色彩。中國式的「寫實主義」

²⁸ 魯迅：〈隨感錄·六十六〉，《魯迅全集》第 1 冊，頁 386。

²⁹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 1 冊，頁 510。

一路走來，中國大陸幾輩作家以為「文學」能夠甚或必須揭示「真理」和「現實」，結合馬克思主義作主導，「真理」所指卻愈來愈狹窄，文學之「正路」大抵是以「人民」（以「民」為搭配詞而非「人」本身）為本位、宣傳政治思想、實現階級平等的政治理想等。³⁰順著中國左翼文藝的發展路向，黃碧雲認為作者探尋的「真理道路」是愈走愈闊，到最後竟是無所謂「真理」，這很可能是出自對中國大陸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發展的反省。如果作者的存在是為了尋找並展示「真理」，那麼「無所謂真理」則使作者重新思考存在的意義。這種思考多少與「存在主義」的思路有所相通。魯迅寫〈故鄉〉的時候帶著為新青年吶喊的包袱，不能明言其絕望的一面，如其言：「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³¹，時代不同，黃碧雲為自己所定下的文學使命也有所不同。她在首本小說集的跋寫道：

寫作必須於人有益，雖然我的寫作對讀者會過於沉重而哀傷，但作品卻是一個淨鍊與提昇的過程——我期待生命最沉重與哀傷之處，都靜下來，留下最清晰的——冰涼而憐憫的，對生命的透視……我不知可否將反反覆覆，互相參照與衝突的存在狀態，鋪陳得清楚可讀。³²

她認為小說並不講求揭示所謂的「真理」，只能在事物的「存在狀態」呈現出來，因此，〈一念之地獄〉沒有在眾多組二元對比之間選擇答案，相反保留了兩者互為因果或對立的狀態。

四、〈失城〉：希望與絕望之虛妄

³⁰ 這裡所指的包括：梁啟超的小說「新國民」「新政治」論、魯迅的文學「改造國民性弱點」論和文學「階級性」論、瞿秋白的文學「政治留聲機」論、毛澤東的文藝「武器」論和「文藝從屬於政治」論。參考童慶炳：《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1-8。

³¹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冊，頁441-442。

³² 黃碧雲：《其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頁202-203。

翌月發表的〈失城〉同樣寫到「路」與「希望」。〈失城〉是黃碧雲的名篇之一，故事講述香港建築師陳路遠一家為了避開九七回歸而移民北美，卻難以適應當地生活，幾經波折，輾轉之下最後又回到香港，他在「油鑊」與「火堆」之間失去了生存的希望，最後決定平靜地殺死全家。故事主要由三組人物敘述，包括陳路遠、詹克明與伊雲思，其中陳路遠和詹克明二人的生存態度和方式形成鮮明的對比，也寄予了作者對當時香港將來的思考。

〈失城〉既是「尋路」的故事，也是「迷路」的故事。陳路遠和妻子趙眉為香港前途憂心而移民北美，先後遷居於亞爾拔亞省加特利城、多倫多、溫哥華三地，陳路遠及後更獨身出走至歐洲，最終還是被趙眉和孩子找上，全家又再回到香港，希冀重新開始，但發現香港已經不是從前的香港，他們回不去了。結果他們由當初尋找出路／活路，到最後卻走上絕路。陳路遠一家的困局並非一時軟弱所致的，正如黃念欣之分析：「每一次地域的轉換，他們的矛盾就加深，重重覆覆，近乎寓言的結構，令讀者感到終點崩潰的必然。」³³較之一個月前發表的〈一念之地獄〉，〈失城〉將「路」與「希望」寫得更直白，陳路遠說：

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而希望從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趙眉不再跟我講關於溫柔、愛、關懷。她和我在這人生的各種歧途之間奔走，已經勞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頁205）

這段話化用魯迅〈故鄉〉名言，卻展示出「歧途」而非「出路」，而陳路遠最後選擇所謂「光明坦直」不過的路，更是「絕路」。

在小說中象徵「希望」的還有「孩子」。趙眉說：「一個孩子就是一個新希望。讓我們好好的，給他關懷、溫柔、愛。」「孩子」的母題在五四文學以來，一直為文學家重視。魯迅昔日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冰心寄望予孩子在心靈上救世，當代作家莫言、閻連科等均各有呼應。³⁴〈失城〉寫及的「孩子」是被動的，大部

³³ 黃念欣：《黃碧雲小說中的「暴力美學」研究》，頁50。

³⁴ 參自劉劍梅：〈文學是否還有救贖的力量？〉，《FT中文網》網站，2012年12月11日，網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947?full=y>（2016年10月5日上網）。

份只是嬰兒。陳路遠的四名孩子明明、小二、小遠和小四都被錯誤地視為希望，因此構成了接踵而來的失望。另一名孩子則要從詹克明說起。〈失城〉開篇從陳路遠的鄰居詹克明開始寫起，他是最初發現陳家血案並報案的人。他玩世不恭，視生命如遊戲。詹克明是救護員，妻子愛玉是殯儀經紀。他們對生死不以為然，例如當詹克明得知伊雲思的兒子自殺後沒有死去，竟感到失望，且說：「也好。生存也不錯，死就更好。」（頁 215）在陳路遠心目中詹克明夫婦就是一對小丑般，整天嘻哈大笑的人物。他起初揭發命案時也被嚇著了，但平復以後「恐怖都變成了滑稽」，夫婦二人竟在澡缸玩血塘遊戲，扮演陳氏的謀殺案，可見他們一套荒謬可笑的生命態度。他在庭上作證時，法官就這樣批評他：「證人滑嘴饒舌，簡直當生命是笑話，法庭是遊樂場、街市！」（頁 207）愛玉最後因細菌感染而早產，他們的孩子一誕下便是痴呆的。在小說結尾一段，「路」、「希望」、「孩子」再次出現：

我們的孩子果真是個痴呆孩子，不大哭。愛玉和我還是歡喜到不得了，夫妻輪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親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還是閃著藍燈通街跑，將傷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痴呆孩子快樂地生長，臉孔粉紅，只是不會轉臉，整天很專注的看著一個人，一件事，將來是一個專注地生活的孩子。城市有火災有什麼政制爭論，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恐。然而我和愛玉還會好好的生活的。……我們總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滿希望、關懷、溫柔、愛。因為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頁 216）

相對陳路遠所尋找的「光明坦正的道路」，詹克明認為生命或死亡的道路並無大異；陳路遠為四個孩子而勞累不堪，詹克明卻毫不為孩子痴呆而憂心，甚至「樂觀」地想像孩子不轉臉就能專注生活。這一節密集出現的光明訊息與詹克明滑稽小丑的角色設定形成了強烈的反諷效果，黃碧雲對詹克明所代表的「樂觀」態度持極大的質疑。詹克明的孩子不會轉臉，單是專注地看眼前的事物，作者寄寓了對香港未來的疑問：若是像詹克明的孩子，只看眼前路，我們又如何走遠？

黃碧雲作品中「希望」與「絕望」的辯證關係，要得連繫至魯迅的作品及其思

想來談。論者早已留意到魯迅的黑暗面³⁵，隨著魯迅背負「我要騙人」的旗號為青年吶喊助威，他漸漸被頹唐的心情包圍，就在 1924 年至 1926 年間寫成了《野草》。他一方面說他的哲學包括在《野草》裡，一方面又希望青年脫離它的影響，糾結反覆的心情可見一斑。³⁶作為尋路的先行者，魯迅在〈生命的路〉或〈故鄉〉都肯定了前路的可能，但多疑的思維使之對於希望又有深刻的懷疑。他在 1926 年寫的〈寫在「墳」後面〉清晰地作出自白：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裡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³⁷

他又在〈希望〉寫道：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而忽然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聽到 Petőfi Sándor (1823-49) 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麼？是娼妓：
她對誰都蠱惑，將一切都獻給；

³⁵ 夏濟安著，萬芷均等合譯：〈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 129-143；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³⁶ 章衣萍：「魯迅先生自己明白的告訴過我，他的哲學都包括在他的《野草》裡了。」章衣萍：〈古廟雜談〉，收入許道明、馮金牛選編：《章衣萍集：隨筆三種及其他》（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頁 93；魯迅〈341009 致蕭軍〉：「我的那本《野草》，技術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後寫出來的。我希望你脫離這種頹唐心情的影響。」氏著：《魯迅全集》第 13 冊，頁 224-225。

³⁷ 魯迅：〈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第 1 冊，頁 299-300。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³⁸

魯迅對「希望」一直抱持懷疑的目光，但他對「失望」、「絕望」同樣懷疑。〈《自選集》自序〉：「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不過我卻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我提筆的力量。」³⁹他更多次引用裴多菲的詩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⁴⁰「希望」與「絕望」因此構成了共存的關係，並發展出其「反抗絕望」的哲學：「〈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所說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⁴⁰以魯迅的作品來看，魯迅小說把陰暗面盡量藏起，例如〈狂人日記〉之開首，甚至刻意創造「希望」，例如〈藥〉中瑜兒墳上的花圈，散文詩則相對敢於呈現其私密的、糾結矛盾的負面情緒。若以此比照，黃碧雲的〈失城〉不但在思想方面遙遙與魯迅有所感通，且將《野草》中關於「希望」與「絕望」複雜的辯證關係深化，透過小說的方式重現出來。陳路遠離開香港到別國尋路，但路途上走得勞累不堪，見證希望之虛妄。及後陳路遠殺死妻兒，以為一家人不再感受到絕望之苦，詹克明無視生死，抱持活著是好、死亡更好的信念，兩者皆落入虛無主義之中，持「無希望／無絕望」的荒誕生命觀。它展示了「希望與絕望同為虛妄」的字面意義。「虛妄」是佛家語，無實云虛，反真云妄，虛妄即不真實的意思。純粹依照字面去理解「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便會得出陳路遠、詹克明的情況。但裴多菲和魯迅的原意都並非指向這種想法。按照句子結構以及上文下理，魯迅的立場大概是：絕望是不真實的、難以確信的，但這就跟希望同樣的不真實和難以確信，人類只能努力反抗絕望。這層意思〈失城〉亦有所處理。作品通過小丑角色詹克明口中說出「真理」而構成的反諷，從而駁斥詹克明「無希望／無絕望」的荒誕生命觀。作品末段把「希望／絕望」的問題訴諸於

³⁸ 魯迅：〈希望〉，《魯迅全集》第2冊，頁181-184。

³⁹ 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冊，頁468-471。

⁴⁰ 魯迅：〈250411 致趙其文〉，《魯迅全集》第11冊，頁477-478。

「信」：「因為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這裡不無反諷的意味，因為上帝創世的事跡是一種信仰，無從驗證，而說有便有的能力也非人類所有，於陳路遠和詹克明來說，希望都是望不可及。總結來說，這部作品以小說的方式展示了一場關於「希望／絕望」的精彩辯證，呈現出多種不同立場的聲音和角度，而並未簡單地讓任何一方佔優，為這項議題保留了開放的空間予讀者反思。我們也可以從〈失城〉看到黃碧雲在思考上如何契接魯迅，與魯迅作品組成互文關係。

五、〈豐盛與悲哀〉：歷史下的個人命運

相隔一年後發表的〈豐盛與悲哀〉延續「希望／絕望」的辯證思考，切入的方向卻截然不同。黃碧雲嘗試借助小說形式凸顯「希望」必須面對的現實因素，又加入「歷史與個人」議題以提升辯證的複雜性。〈豐盛與悲哀〉是一齣「戲中戲」，戲外寫一班香港電影工作者回國內拍攝電影，電影故事以中國五十年代至文革期間的歷史為背景，戲內講述人物幼生和趙眉在上海淪陷時相遇並共同生活，後來經歷文化大革命。

在戲外層次中，男演員早年事業並不順利，試過唱歌和跳舞，又演過臨時演員，在流行功夫片的時候去當武師，一心「以青春換希望」，結果連人帶車墮山受重傷。他「自此對生命開始輕鬆，時常開自己的玩笑」，後來當上三級片主角，儘管面對生命已經比較從容，但還是有尊嚴掃地的感覺。在拍攝這次的電影時，他已經得知自己患上鼻癌，而且血流了一身，最後在醫院死了。而女演員則在這次拍戲中遭受兩次沖擊，先是男演員跟她對戲時流血入院，後來死了，使她對生命有重新理解的契機，其次是與已婚美術指導的戀情隨電影拍攝完畢也告一段落，她也從美指的訪問中識悟了世間充滿虛幻和謊言。她當晚在樓梯間流淚，反思起自己的人生：「好像打從攝影機第一天對著我開動，我便放棄了將來，成天在等，等埋位，等化妝，等走

紅。」(頁 95) 後來她嘗試離開娛樂圈尋找新的將來，卻做生意不成，最終又重拾演藝事業，被送進過精神病院，後來「慢慢變得凡事很淡然」，墊鼻隆胸，男人來者不拒，也接拍脫衣戲。男演員和女演員的演藝歷程非常相似，作者描寫他們反復經歷希望和絕望，每當到達絕處，希望又暗自生來，卻隨時再次消失，重重覆覆，人類極其卑微地活著。小說反思在外在環境／歷史之下，人難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只能無奈地在希望和絕望間顛簸，這樣起起伏伏的人生，到底是豐盛還是悲哀？

〈豐盛與悲哀〉的戲內層次以描寫趙眉一生的經歷為中心。趙眉來自蘇州，到上海當舞女。在日軍進城的時候，她正懷著陳秋雨的孩子，但陳秋雨一直沒有出現，臨盆時是同住在永安弄的交通大學工程系學生幼生送她到醫院，後來二人便結合了。在戰爭中，趙眉因為生計的考慮而決定離開幼生，而解放軍入城的時候，二人在人叢中重逢，民眾正呼喊著「讓我們重新開始」，而趙眉也對幼生說「讓我們重新開始」。小說寫道：「趙眉流下了快樂的眼淚，她從來沒為革命做過些甚麼，希望卻在良好意願中誕生。」她又輕輕在幼生耳邊說：「我吃過人肉了。……孩子死了，我太餓，吃了它。」但幼生不介意，小說寫道：「趙眉以為已經沒有希望。和幼生在舞池中共舞，希望還是在黑暗中生長。」(頁 104) 在這一頁的篇幅內，小說兩次出現有關「希望」的句子，強調「希望」不論在良好意願還是黑暗中都會出現。然而，在戰爭過後，趙眉又回到說書院、戲院唱戲，不久又有了身孕，卻不是幼生的孩子。幼生起初原諒趙眉，直至孩子八歲那年，他才發覺自己恨她，便以「舊世界的妓女」、「國民黨走狗的情婦」的罪名舉報了趙眉，趙眉因此被下放安徽。後來幼生帶同孩子探望她，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她飢餓得連孩子叫喚也無法回應。幼生見狀，便說將會想辦法讓她回來，必不會離棄她，但趙眉對生命已失去盼望，只回答一聲「無所謂了」。三年「自然災害」後，趙眉大難不死，又再回到上海生活、唱戲。

及後在文革期間，趙眉、幼生都遭受批鬥，二人被剃了陰陽頭，有時在牛棚碰到，竟荒誕而幽默地相視而笑。在這次絕境之中，趙眉又生了另一番體悟：「人生的道路果然柳暗花明，很多莫名奇妙的關口，以為是絕路，在此卻恍然大悟。」(頁 111) 她忽然明白到「愛之軟弱與堅強」，可以是絕路上的希望。在文革結束後，趙眉重新唱戲，並在美國漢國學家漢斯的邀請之下有機會隨評彈團到美國東西岸大學

演出。後來漢斯更向她求婚，小說寫道：「趙眉想到了希望。她忽然明白，合理的人生即便年紀老邁，仍然有希望。」（頁 110）漢斯的出現彷彿是趙眉生命中的陽光，小說這樣描述他的形象：

漢斯看來有五十年紀，孩子似的，老在用語調古怪的普通話驚嘆：多麼美，多麼令人感動。趙眉總覺他非常幼稚。頭髮都快掉光了，還在感動驚嘆。他又喜歡孩子，上海的黃魚，和整城的自行車和鈴聲。（頁 112）

漢斯年紀跟趙眉相近，但內心卻如孩子般天真，滿有青春氣息，因此打動了本來心如槁木死灰的趙眉，使她重拾「希望」的信念。至於幼生，他也跟淑貞結婚了。趙眉和幼生更互相祝願對方。

黃碧雲在〈豐盛與悲哀〉中嘗試把有關希望的辯證推向「歷史與個人」的面向。她有意藉文化大革命作為背景，探問「個人」在「歷史」之下應當如何看待自己的命運。假若「個人」有能力改變歷史，「希望」自然是有的，但現實中往往是相反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企圖掌握自身命運是否有效／具意義呢？趙眉在希望和絕望之間歷劫求存，在「本事」中以「個人」反抗「歷史」的主宰：「歷史起起落落她不管。她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頁 111）小說另一處同樣處理「歷史」的位置。在趙眉離開上海前往美國的當日，在機場遇上航班誤點，一位同志忽然就唱起「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其他排隊的同志也混著唱。小說寫道：「趙眉可不知道社會主義好不好。她只知道，一生的事情可夠多的。可能與甚麼主義無關。」（頁 113）黃碧雲不是從對與錯的角度去談論「歷史」，而是透過以趙眉代表「個人」嘗試去超越／揚棄「歷史」。在這種思維模式和立場之下，「希望」似乎得到了一種新的意義，它可以無關於歷史的起落，而在於「個人」的最終選擇。

作者似乎無意為議題提供單一的答案，而是竭力呈現問題的複雜性，並探求多層次、多面向的可能性。小說採用「戲中戲」的形式，為的是最後將議題推近現實。在劇本上的安排只在小說中「本事」部份出現，進入「演出」部份時卻因男演員患病進院而必須改寫劇本，於是趙眉從安徽回來後便找不到幼生了，她對希望、愛情、人生的體悟也因此而需要重寫。本來趙眉的人生在文革後得到新的方向，並在遇到漢斯後對希望有極其正面的體悟，但無奈在現實限制之下人生得到改寫，結局未明。

在現實的限制面前，希望可謂虛妄。但小說同時對於放棄希望有所批判。小說最後著力寫戲外層次的導演。導演相對其他人物具有更大權力，不論戲內或戲外，他是最有可能改變現況的一人。他年輕時對電影滿有熱誠，因為「有話要說」而渴望拍電影，但直到他當上導演時，初心已經有所動搖。他接受了現實的限制，所接拍的電影「除了賣座，一無是處」，其電影乃至其人生都走平庸路線。但他未完全麻目，經常在拍完電影最後一場後，他便為人生感到寂寞和悲哀，良心又常來「追債」。就在他探望男演員後步出醫院時，心裡曾想過推掉下一部《連環姦殺奇案》的戲，然而他轉眼就忘記了那一剎那的反省與啟悟。他說：「連人杜撰出來的故事，也不能為人所掌握，更不說不為人知的命運了」，又以「我是沒有辦法的呀」開脫。（頁 118）面對諸多現實限制及外力的影響，導演選擇放棄信念，安於命數，讀來只感悲哀，相較之下，或許趙眉「反抗絕望」的決心使其坎坷人生反而更見豐盛。

六、〈江城子〉：悼亡魂，思生死

〈江城子〉寫成於 1994 年 8 月，是四篇小說中最長的一篇，也是最複雜的一篇。題目開宗明義要寫悼亡，既悼 1994 年 4 月病歿的友人香港托派份子吳仲賢，也悼 1989 年犧牲的六四事件死難者，當中涉及的議題包括中國社會、歷史與個人、左翼思潮，甚至討論到唯物史觀的問題。黃碧雲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如何借助魯迅的經驗來思考當前的困惑，正是本文所關心的。魯迅在 1926 年和 1931 年分別經歷三一八事件和左聯五烈士被殺，他對劉和珍、柔石等青年後輩的犧牲抱有深切的悲痛，因而寫下了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無花的薔薇之二〉、〈為了忘卻的紀念〉等文章。在魯迅與黃碧雲眾多具影響關係或可供對讀的面向之中，本文嘗試將魯迅在上述事件中的思考比照黃碧雲對六四事件的反思。

（一）「忘卻」與「紀念」

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事件發生。北京民眾聚集兩萬多人舉行反對八國通牒示威大會，會後遊行，當遊行隊伍到達執政府門前時，執政府衛隊先以大刀、木棍毆打群眾，接著開機關槍掃射，事件中死者四十餘人，傷者約二百人。據許廣平所述，女師大學生劉和珍和楊德群就在事件中「活生生地被打成僵死的屍體，鮮血淋漓地被抬了回來」。⁴¹劉和珍是女師大學潮的中堅份子，也是魯迅的學生。魯迅在當天得知其死訊後，便擱下原來已寫三節、批評陳源和章士釗的文章，在〈無花的薔薇之二〉第四節起改為譴責段祺瑞政府：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⁴²

魯迅及後數天連續再寫了幾篇文章談論這件事，例如〈「死地」〉、〈可慘與可笑〉、〈空談〉等，又為劉和珍之死寫下〈記念劉和珍君〉。

另一位犧牲者令魯迅感到同樣惋惜悲痛的是柔石（1901-1931）。柔石，本名趙平復，1925年曾在北京旁聽魯迅的課，及至1928年遷居上海與魯迅成為近鄰，方互相結織。在1928-1930年間，魯迅忙於組織及出版各雜誌刊物，柔石也樂意為之當助手和跑腿，二人關係甚密。在魯迅心目中，柔石是一個極願意「損己利人」、熱心於改變社會的青年。1931年1月7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米夫在上海秘密舉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扶持王明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惟部份成員反對。兩方其後分裂，不承認四中全會的成員組成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非委），「非委」之下有文藝組織「中國革命文藝聯盟」（革文聯），成員包括後稱左聯五烈士的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和李求實。1月17日「非委」在上海東方酒店開會時被政府便衣警察包圍，其中23人在2月7日深夜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處死，柔石便是其中一人。由於國民黨封鎖消息，直至3月底方有刊物公佈左聯五烈士遇難之事。魯迅在4月秘密發行左聯刊物《前哨》，創刊號便是「紀念戰死者專號」，他亦發表了

⁴¹ 見許廣平《魯迅回憶錄》，轉引自朱正：《魯迅傳》（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178-179。

⁴² 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魯迅全集》第3冊，頁277-281。

〈柔石小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文章。兩年後，他再為柔石寫下〈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其中有舊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⁴³

魯迅在寫下這些紀念文章時，特別強調了「忘卻」與「紀念」的對立和消解。由於他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作出思考，他不相信死後世界或靈魂。死者唯一「活著」的方式就是透過生者的紀念，所以他說：「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⁴⁴然而，人都是善忘的，為了正常活著，人們不可能永遠活在沉痛之中，但那些沉痛的記憶一旦被人淡忘，死者便真的死掉了，犧牲者如劉和珍、柔石更會成了白白的犧牲。魯迅在幾篇文章都談到「忘卻」：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⁴⁵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⁴⁶

黃碧雲〈江城子〉同樣為了紀念而寫，小說開宗明義談到六四事件。然而，作品所悼念的不只是八九民運死難者，也有 1994 年因病逝世的托派份子吳仲賢。〈江城子〉「其後」寫道：

⁴³ 有關魯迅與柔石的資料，可參朱正：《魯迅傳》，「第 21 章」，頁 278-290；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魯迅全集》第 4 冊，頁 493-504。

⁴⁴ 魯迅：〈空談〉，《魯迅全集》第 3 冊，頁 296-300。

⁴⁵ 魯迅：〈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 3 冊，頁 289-295。

⁴⁶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魯迅全集》第 4 冊，頁 493-504。

這個故事，與吳君無關，卻因為吳君而寫。很多人喜歡從故事中索隱，找尋故事與作者其人其事的關係，實在不明白小說與生命的辯證關係：小說為生活啟發，卻超越生活，超越作者自身的經驗，經過思索，成為集體智慧，我相信這就是小說的藝術。吳君向來都不提我的寫作。我相信他並非我的讀者，所以與他交往，自由愉快，比較好。而我卻一直努力駕御[馭]寫作，那就是：即使我不寫作，我仍要做一個有價值的人。吳君死前，給我一封信。囑我好好寫作。但我卻立定主意，寫作並非我生命的全部。絕不。如今我寫作，不過呼應鬼魂的召喚。

吳仲賢，學生／社會活動份子，媒介工作者，馬克思主義者，歿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終年四十八。(頁 256-257)

這段文字提醒了讀者，吳仲賢是理解這篇小說的重要關鍵，但方向不在於「找尋故事與作者其人其事的關係」，而在於左翼份子吳仲賢病歿成為了這篇創作的動因，驅使黃碧雲以小說的方式開展另一場重要的信念辯證。

吳仲賢(1946-1994)是香港托洛茨基主義派系的重要人物⁴⁷，他在1994年病逝，當時黃碧雲在專欄寫過三篇文章紀念他，後來才發表小說〈江城子〉。⁴⁸黃碧雲並不諱言自己與本地社運人士的關係，例如她在專欄中經常提到她的社運朋友：「雄仔」

⁴⁷ 吳仲賢(1946-1994)是香港托洛茨基主義派系的重要人物。他早於六十年代末在學時期已活躍策動及組織社會運動，例如1969年策動的「珠海事件」為保守的學界帶來重大的衝擊，具領起七十年代青年學生運動之功。他在1970年與莫昭如等人創辦《70年代》雙周刊，推動新思潮，鼓動社會抗議行動。後來吳仲賢與何仁、葉寧等左傾青年經樓國華引介之下到法國找彭述之，他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有所改變，最後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吳仲賢深受托洛茨基主義影響，加入了「第四國際」(正式名稱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返港後又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即「革馬盟」)，推動工潮社運。1981年3月吳仲賢隻身進入國內，因嘗試串結民運份子而被捕，寫悔過書後獲釋返港，卻不獲組織內其他成員見諒而被開除黨籍。1982年起，他加入新聞界工作，經常撰文議論時政。1989年在北京爆發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他在初期已極度關注，積極在港發起支援行動，也是支聯會籌組期間的主要策劃人之一。1990年10月吳仲賢舉家移民至澳洲，但經常往返香港。1994年3月不幸患上癌症，4月3日回港就醫，同月21日逝世。在他病重期間，香港《明報》記者席揚被捕，他亦有撰文聲援，可見他對中港時政的關心。有關吳仲賢生平資料，筆者參考自《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及網絡維基百科資料。吳仲賢著，吳葉麗容編輯及出版：《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樂文書店，1997)。

⁴⁸ 1994年4月17日黃碧雲在《明報》「暫且」專欄〈接二連三，很憤怒又很悲哀〉寫到吳仲賢：「而吳君病重，我的心情隨他的病情而起起跌跌，時而淚流滿面，時而平靜安好。」吳仲賢在22日逝世後，黃碧雲在5月1日及8日於《明報》分別發表〈憶舊〉、〈傷逝〉紀念他。

(梁國雄)、「山青」(劉山青)、「Q仔」(黎則奮)、「張文」(張文光)等，都是自七、八十年代起活躍於本地、為人熟知的社運份子。然而，關於黃碧雲何時、如何結識吳仲賢、其他托派份子以及泛民主派人士，目前研究者所知甚少，資料相對缺乏。筆者從黃碧雲後來為吳仲賢而寫的〈給死者的一封信〉一文中，推測黃碧雲應在八十年代中期或之後才認識吳仲賢。⁴⁹在文章中，她寫道：

如果我們願意接近真實，就應該忘記你，忘記「火紅年代」。那是一小撮人的偏好。……這樣我必須忘記你。有時我可能，有時總是難捨。待所有人都忘記你了，這樣，你就成為我，私密的，這樣我就可能，時常思念，不再提起。⁵⁰

這段思考涉及黃碧雲對於「火紅年代」的歷史看法，非本文著重討論的，但亦可從此得見她對於「忘記」和「紀念」具有複雜的思考。這篇文章是黃碧雲較後期寫的。如果說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結尾寫出自己受哀痛所困而選擇「忘卻」，並把「紀念」的責任留給群眾，那麼黃碧雲在這篇文章展示了相反的面向——她認為自己必須忘記吳君，拒絕過往對「火紅年代」的浪漫想像，但有不捨，而更弔詭的是她希望別人把吳君忘卻，使之成為她私密的紀念對象。

回到〈江城子〉，這篇小說跟魯迅文章中對於犧牲者的價值和意義之思考呈現出較為近似的立場，下文先點明魯迅對於犧牲者的價值和意義所下的判斷，及其背後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從而對照〈江城子〉相關例子。

(二)「惜生」與「犧牲」

在三一八事件中，社會主流是支持學生一方的，認為執政府殘暴不仁的，更出現了「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的說法。魯迅儘管也為死去的學生感到莫大的悲痛，但對這種革命浪漫化、神聖化的論述保持高度的警惕，並抗拒這種將生命價值矮化的言論。他沒有無條件地站在學生一邊，而是深

⁴⁹ 「我認識你的時候，比較遲，也就是，你『理想失落』『不再火紅』的年紀了。……我認識並且接近的那個你，……和那些『火紅』的人民認識的那個你，大有不同。」見黃碧雲：〈給死者的一封信〉，《後殖民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頁192-195。

⁵⁰ 黃碧雲：〈給死者的一封信〉，《後殖民誌》，頁194-195。

切地反思造成這場慘劇的原因和死者犧牲的意義。他在文章〈空談〉裡清晰地寫到，除了政府應為此負責任之外，群眾領袖看輕了對手也是不智，並重申生命的寶貴：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⁵¹

對於三一八的犧牲者，魯迅肯定他們流血的價值、犧牲的意義，但同時反對後來者延續這種抗爭的方式。他認為這次犧牲的價值和意義，就是測出執政府的「陰毒」，以及影響到身邊更多的人：「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⁵²可是從此之後，為請願而犧牲生命，決不可再，他又勸告青年珍惜生命，不作無謂的犧牲。同時，魯迅對於「珍惜生命」的結論是留有餘地的，他反對再用「請願」的方式，不作無謂的犧牲，但不代表不能犧牲——革命不可能沒有犧牲就成功，魯迅深明此道。所以他在文末說：「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⁵³犧牲者的淡紅血痕不單留給「苟活者」微茫的希望，更可以讓「真的猛士」有動力奮然前行。這就是魯迅對於「惜生」與「犧牲」的辯證式反思。

八九民運以後，黃碧雲心裡同樣生出了「珍惜生命」的意願。江城子就是從此開展，卻又最後因病者（吳仲賢）的生命無常，令她藉小說解構了「惜生」與「犧

⁵¹ 魯迅：〈空談〉，《魯迅全集》第3冊，頁296-300。

⁵² 魯迅：〈紀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3冊，頁289-295。

⁵³ 魯迅：〈紀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3冊，頁289-295。

牲」的二元對立，提出尊重於人類自由意志的生活態度。〈江城子〉圍繞醫生陳思過身邊人物開展五條故事線⁵⁴，小說以「五年了」破題，談的正是作者在創作當下的時間點（1994）對「八九民運」的小回顧。整篇小說的敘述跨度為五年，五組人物之浮沉皆限在 1989 年至 1994 年間，當中人物對六四事件有所寄寓，以下試圖為之作出解讀。

若將故事內的時間線理清，本事源自 1989 年陳思過生命中出現的三件事：游憂逝世、王敬失蹤、惜生出生。游憂是一名十九歲的學生，性格純良，患癌不久便在「盛大的夏日中午」（頁 227）死去，所指的正是在六四事件中喪生的學生青年民運人士。陳思過的丈夫王敬某天無故失蹤也是同時發生的，及後陳思過發現同床多年的枕邊人竟是同性戀者，且另有男伴。這段瓦解的夫妻關係可象徵性地置換為國／民關係，陳思過在既定的倫理關係中失去了原有位置，面臨身份的迷失，即如當時的知識份子經歷六四事件後在家國想像與身份認同之上都有所失落。至於兒子惜生，他是陳思過在 1989 年誕下的胎兒。惜生之名，顯然寄寓「珍惜生命」的意願。將三件事連結起來，從青年喪生到家國想像與身份認同的破滅，並萌生「珍惜生命」的強烈意願，陳思過的經歷就是一篇六四事件的心跡錄。黃碧雲以此寄寓自己五年來的心路歷程。在現實中，她雖然反對政府開槍鎮壓，但同時心懷「珍惜生命」的意願，認為犧牲性命實在不必要。故事後來出現了變化。起初是陳思過的信念出現動搖：「我們以為為多人的鮮血啟悟，我們以為我們堅信。但。我們以為我們意志堅定，感情高貴。但。我心裡竟起了讓惜生死掉，從來未出生的念頭，我大吃一驚。」（頁 246）後來惜生在五歲時更無故死亡，象徵這種「珍惜生命」的意願只是短暫出現在她生命之中：

惜生惜生。多奇怪的名字。我的意願還是落了空。惜生吊在窗旁，臉孔呈藍色。……我將她解下來。才五歲，我怎樣解釋她奇怪的死亡。正如王敬失蹤一樣，永遠是個謎。（頁 250）

對於惜生死亡的原因，讀者可從歐細明身上找到提示。歐細明癌病復發，死後成了

⁵⁴ 五組主要人物分別為：1. 丈夫王敬、兒子惜生；2. 病人游憂；3. 病人歐細明和朋友周約亞；4. 病人張小綠及其丈夫方木耳；5. 參與遊行的教師、社工、小販、政治犯、酒吧侍應、提琴手。

鬼魂，問陳思過：「陳醫生。如果有人想死，你到底要不要勸他呢。」當時陳思過已經歷過惜生的死，對生命的意義另有體會，因而交出答案：「人有自由意志的吧。要死由她死。沒辦法。」（頁 249）珍惜生命的意願在 1989 年生來，但隨時間的推移、生命的無常，陳思過相信珍惜生命並不應該凌駕於自由意志；只要是出於自由意志，人類有權追求有超越生命的價值。由此，我們得見魯迅和黃碧雲對於「惜生」與「犧牲」的思考有所契合。

（三）真的有地獄嗎？

〈江城子〉中游憂兩次問地獄的情節，顯然脫胎自〈祝福〉。在魯迅筆下，受封建禮教壓抑的祥林嫂問敘事者：「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作為受過教育的敘事者只能支吾以對，吞吞吐吐地回答「也許有罷。」不料祥林嫂竟追問：「那麼，也就有地獄了？」經她再三追問，敘事者已膽怯得不敢回答，甚至想推翻自己的答案：「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⁵⁵〈祝福〉描述知識份子所遇到的困境，他們的「新知識」（包括自晚清傳入的進化論、唯物論思想）對於舊社會、舊時代的人來說，是有可能帶來傷害的。他在文章中就曾寫道：「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⁵⁶不論天國之有或地獄之無，都是出於安撫，魯迅對靈魂（鬼魂）或死後世界還是持質疑的態度的，他在臨終那年談「死」的時候說：「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⁵⁷魯迅從青年時期信奉進化論及個人主義，到「五四」前後至 1927 年間接受接觸大量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以及 1927 年後集中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及支持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其對唯物史觀之接受自是一大課題，卻不是本文所要探究的。本文關注的是黃碧雲如何挪用魯迅〈祝福〉中的經典情節作為資源，以重寫的方式

⁵⁵ 魯迅：〈祝福〉，《魯迅全集》第 2 冊，頁 6-8。

⁵⁶ 魯迅：〈我要騙人〉，《魯迅全集》第 6 冊，頁 503-508。

⁵⁷ 魯迅：〈死〉，《魯迅全集》第 6 冊，頁 631-635。

展現出她對中國左翼思潮發展的反思。⁵⁸

〈江城子〉多處從學理上嘗試為「唯物主義」作出自我質辯與反詰，包括游憂向陳思過問地獄的情節：

他[游憂]總是大開窗子，靠在窗前大力的呼吸，膝上擱著一本但丁的「地獄曲」，鼻血無端流下，像眼淚。「真的有地獄嗎，陳醫生。」我答不上來，只好說：「醫學院沒有教。出來工作也學不到。」想想又道：「大概沒有的吧。人不過是物質。死了就是物質存在的終結。」他便靜靜的合上書本，雙手蒼白透明而寧靜，像大理石。看看我，說「明年野火花開放的時候，大概已經沒有我的份兒。」（頁 223）

後來游憂問陳思過當醫生到底是怎樣的職業，為何面對死亡還可能說笑？陳思過回答：「這是個唯物主義者的職業。」小說接道：

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相信，人類社會面貌由勞動者創造。

一九八九年是一個啟悟。我們在一個學習中國歷史的學習班上見了面。一個基督徒企圖向我們傳道。政治犯便說：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相信，除了我們自己的一雙手，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因為政治犯很認真，咬著牙，說著說著，便掉了一排假牙。

我們第一次聽到有關唯物主義。

與一隻空洞的，黑暗的，沒有牙的口有關的唯物主義。

事物的嚴肅與荒謬，往往並存。

以致我對於生命，猶豫不決，難以將之定性。

死亡有其滑稽的一面，亦有其莊嚴的一面。（頁 224）

陳思過向來對死亡沒有太大的感受，她從醫學書得到的知識是：「死亡是物質終結的必然現象。」然而，游憂的出現乃至死亡卻動搖了她的信念。她開始分析起自己的

⁵⁸ 有關於黃碧雲與左翼運動及思潮的立場，可參閱盧敏芝：〈火紅年代的溫柔與暴烈——論黃碧雲作品中的歷史、左翼與本土性〉，《中國現代文學》27（2015.6），頁 209-224。該文討論之作品為〈盛世戀〉和〈嘔吐〉兩篇小說。

情感：「但我還是覺得傷心了。為甚麼呢。……經驗讓我知道眼淚的無用。然而我傷心了，除了眼淚，還有甚麼安慰呢。」（頁 229）小說甚至直接談到六四事件帶來的情感：「如果我們覺得屈辱痛苦，是因為我們的意志正與物質世界的必然規律鬥爭，而且面臨必敗的結局。」（頁 232）黃碧雲十分強調個人面對歷史時所遭受的「必敗」結局，她認為個人的主觀意志根本難以撼動歷史，正如小說所說：「我們的卑微使命，不過是對命運說不。但。」（頁 228）前句的含義跟魯迅「反抗絕望」的思維同出一轍，最後卻加上了語義含糊的「但。」，加強了當中的無力感。小說又借已轉行為經紀的酒吧侍應之口調侃其他堅持遊行、革命的人物：「你的主觀意志，不足以轉移事物的發展規律。」（頁 229）這種悲觀的歷史觀照貫穿〈一念之地獄〉、〈失城〉、〈豐盛與悲哀〉，然而，在〈江城子〉最後部份有所變化，黃碧雲在各種二元對立之中終於嘗試提出一種答案。

小說寫游憂死後，陳思過開始看見鬼魂／幽靈，揭示了她的唯物主義信仰產生了變化，逐漸過渡至接受世上有「鬼魂」的思想。在惜生也死後，陳思過的人生觀照也得以更新：

我全身如浸在水銀中一樣為之侵蝕。

如在火宅中。

如遇阿修羅。

怖畏。衰惱。憂患。無明。闇蔽。……

我們以為從此滅亡。

希望是甚麼呢。希望有沒有物質基礎。

唯物主義不能解答生死的問題，不能解釋肉身的逝世，不能解釋意志。

我轉介了所有的病人，關了診所，到了印度加米爾高原。那是個美麗的高山和湖，我住在船上，早上起來讀蓮華經，直到夕陽跌落。

在人間，貧窮困苦，怨憎會苦，眾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為患。

周約亞恍然大悟。

如渡筏，過河即棄。

肉身之苦，不外如此。

明報記者席揚被捕。政治犯魏京生釋放後再次被捕。我們還是不期而遇，走到街上。

執生甚苦。張小綠幾時才明白。(頁 252-253)

這部份句與句之間極為跳躍，時而談論哲理層面的問題，時而轉入述評小說人物，時而直寫社會當前發生的事件，卻不離對希望、唯物主義和中國社會發展的省思。通過經歷游憂、惜生之死，陳思過不以唯物史觀看待事物，而選擇相信「沒有物質基礎」的希望，並以佛教的觀點解釋生死、生存的問題。小說尾段出現了一次重寫，虛擬陳思過再有一次機會面對游憂：

游憂問：「真的有地獄嗎，陳醫生。」我便道：「佛家有所謂涅槃，就是超越地獄的意思。」他便靜靜的合上書本，雙手蒼白透明而寧靜，像大理石。看看我，說：「明年野火花開放的時候，大概已經沒有我的份兒。」我只道：「原來就沒有你的份兒，是你將自己看得太重要。」他便道：「這好。這我會想一想。」……

他死時我只在床頭插了一大束百合花。人死如香氣的寂滅，從無到無，雖然沒甚麼好傷心的，我還是紀念眾人必死的命運，心中充滿蒼涼的慈悲：我願眾生無苦，生死不侵。

事情總會發生，只在乎我們如何演繹。如游憂的死。

結局竟然十分之唯心。我亦無法想像答案會是這麼的一個情景。我向來是個無神論者，而且相信命運為個人創造。我在一個明藍的黎明，想念到生命的無常，耳畔卻響起了貝多芬的命運。

如今我活，敬生惜生。他們的死改變了我的生命。這樣一來，他們無心造就，卻有所完成。(頁 254-256)

從游憂兩次問地獄的情節可見，黃碧雲挪用魯迅〈祝福〉情節，為中國左翼思潮發展中的唯物史觀作出反思。她認為唯物主義過度樂觀地想像人類有能力改變社會並掌握自己的歷史和命運，而且這種左翼狂熱注定在歷史事件面前碰壁。她反思人類必死的命運，探問「眾人必死的命運」的意義為何，並從意志之延續的角度肯定死

者留給生者的意義。

七、結語

本文通過考察黃碧雲在 1992 年至 1997 年間的專欄文章及小說，整理和分析在該時期作品中反復出現的魯迅身影，從而闡明魯迅與黃碧雲的文學關係。首先，本文分析了黃碧雲在專欄文章中與魯迅有關的部份，從中發現魯迅的社會批判成為黃碧雲思考社會問題的重要參照點，也得見她對魯迅複雜多疑的思維極其欣賞，更嘗試過模仿其作品風格。接著，本文以「希望／絕望」、「寫作與真理」、「歷史與個人」作為切入點，討論到〈一念之地獄〉、〈失城〉、〈豐盛與悲哀〉和〈江城子〉四篇小說，在生命觀照、寫作態度、歷史觀等層面闡發二人契合之處。

在當代作家的魯迅譜系中，黃碧雲接續了魯迅作品中對「希望／絕望」的思考。在〈失城〉和〈豐盛與悲哀〉中，她反覆書寫顛簸人生路途上的困惑，擬設直面個體生命意義的多種可能性。她極力將魯迅不願示人的黑暗面在小說中鋪陳出來，並對個人、左翼、歷史等議題不止地作出探詢與挖掘。在〈江城子〉中，她藉悼亡「六四事件」反思現代中國「歷史」與「個人」的緊張關係，其中不乏對左翼、歷史等議題作出探詢與省思。通過比照魯迅在「三一八事件」和左聯五烈士被殺事件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黃碧雲不僅受益於魯迅的歷史經驗，更是有意挪用魯迅筆下的經典場景或文句以重啟話題，從而表達她的反思。本文冀望通過上述個案，為香港文學研究投入新的研究方向，重新關注香港當代作家與五四文學之間的連繫。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吳仲賢著，吳葉麗容編輯及出版：《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樂文書店，1997。

黃碧雲：〈悲哀的靜默表演〉，《明報周刊》，1993年12月5日。

* 黃碧雲：《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

黃碧雲：〈突如其來的，殘酷的，覺醒〉，《明報周刊》，1994年1月30日。

黃碧雲：〈九七格〉，《明報周刊》，1994年1月16日。

* 黃碧雲：〈為了忘卻的紀念〉，《星島日報》，1994年2月3日。

黃碧雲：〈後殖民小字典〉，《明報周刊》，1994年2月6日。

黃碧雲：〈文明無血〉，《明報周刊》，1994年2月27日。

黃碧雲：〈野草〉，《明報周刊》，1994年3月27日。

黃碧雲：〈接二連三，很憤怒又很悲哀〉，《明報周刊》，1994年4月17日。

黃碧雲：〈憶舊〉，《明報周刊》，1994年5月1日。

黃碧雲：〈傷逝〉，《明報周刊》，1994年5月8日。

黃碧雲：〈不要輕言 XX 和 XX〉，《明報周刊》，1995年7月30日。

黃碧雲：〈比重更重，比輕更輕〉，《明報周刊》，1995年9月10日。

黃碧雲：〈給魏京生〉，《明報周刊》，1995年12月24日。

黃碧雲：〈港罵〉，《明報周刊》，1996年6月9日。

黃碧雲：〈遊園驚夢〉，《明報周刊》，1996年9月29日。

黃碧雲：〈孤獨者〉，《明報周刊》，1996年10月13日。

黃碧雲：〈孔乙己〉，《明報周刊》，1996年12月8日。

黃碧雲：〈過譽〉，《明報周刊》，1999年4月10日。

黃碧雲：〈給死者的一封信〉，《後殖民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頁192-195。

黃碧雲：《其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

黃碧雲受訪問，周眠撰文：〈黃碧雲：灣仔烈佬有話說〉，《明報·世紀版》，2012年8月16日。

黃碧雲：《烈佬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黃碧雲：《微喜重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

* 魯迅著，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二、近人論著

* 一丁（樓國華）：《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香港：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

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收入劉紹銘等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7-18。

* 危令敦：〈血紅的無人之境——試論黃碧雲的「溫柔與暴烈」〉，《中外文學》28：10（2000.3），頁162-184。

朱正：《魯迅傳》，香港：三聯書店，2008。

*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二十一世紀》19（1993.10），頁39-51。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凌逾：〈重構中西文化因數——從非虛構的虛構看文學大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016.8），頁161-166；收入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編：《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黃碧雲《烈佬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頁111-128。

夏濟安著，萬芷均等合譯：《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章衣萍著，許道明、馮金牛選編：《章衣萍集：隨筆三種及其他》，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

童慶炳：《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黃念欣：《黃碧雲小說中的「暴力美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

文學學部哲學碩士論文，2000。

黃念欣：〈花憶前身——黃碧雲 vs. 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文學世紀》2(2000.5)，頁 14-20。

劉劍梅：〈文學是否還有救贖的力量？〉，《FT 中文網》網站，2012 年 12 月 11 日，網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947?full=y>（2016 年 10 月 5 日上網）。

* 盧敏芝：〈論黃碧雲小說與張愛玲小說的文學關係〉，宣讀於「香港亞洲研究學會第八屆研討會」，香港：香港教育學院主辦，2013.3.8-9。

* 盧敏芝：〈火紅年代的溫柔與暴烈——論黃碧雲作品中的歷史、左翼與本土性〉，《中國現代文學》27（2015.6），頁 209-224。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ee Ou Fan, “‘Pi Ping Kong Jian’ De Kai Chuang: Cong Shen Bao ‘Zi You Tan’ Tan Qi” [The Creation of “Critical Space” -- from *Shun Pao*] in *Er Shi Yi Shi Ji*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ol. 19, (Oct, 1993), pp. 39-51.
- Lin Yu, “Chong Gou Zhong Xi Wen Hua Yin Zi- Cong Fei Xu Gou De Xu Gou Kan Wen Xue Da Shi” [Reconstruc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Factors: The Trend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fictional Fiction], Vol. 4, (Aug, 2016), pp. 161-166; adopted 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Di Wu Jie Hong Lou Meng Ping Lun Ji: Huang Bi yun Lie Lao Zhuan*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of the 5th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 Award: Wong Bik Wan’s *Children of Darkness*],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2016), pp. 111-128.
- Lo Man Chi, “Lun Huang Bi Yun Xiao Shuo Yu Zhang Ai Ling Xiao Shuo De Wen Xue Guan Xi”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of the Fictions of Wong Bik Wan and Eileen Chang], Prepared Speech in The 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SAHK),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8-9 Mar 2013.
- Lo Man Chi, “Huo Hong Nian Dai De Wen Rou Yu Bao Lie-Lun Huang Bi Yun Zuo Pin Zhong De Li Shi, Zuo Yi Yu Ben Tu Xing” [Tenderness and Violence in the Flaming Times: On the History, Left-wing and Locality in Wong Bik-wan’s Works” in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Vol. 27, (Jun, 2015), pp. 209-224.
- Lu Xun, *Lu Xun Quan Ji*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18,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Ngai Ling Tun, “Xue Hong De Wu Ren Zhi Jing - Shi Lun Wong Bik Wan De Wen Rou Yu Bao Lie” [Bloody Domain of Death: Notes on Huang Biyun’s Tenderness and Violence] in *Zhong Wai Wen Xue*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Vol. 28:10, (Mar, 2000), pp. 162-184.
- Wong Bik Wan, *Wen Rou Yu Bao Lie* [Tenderness and Violence],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1994).

Wong Bik Wan, "In Memory of the Forgotten", *Sing Tao Daily* (3 Feb 1994).

Wong Nim Yan, *Huang Bi Yun Xiao Shuo Zhong De 'Bao Li Mei Xue' Yan Jiu* [A Study on the "Aesthetics of Violence" in the Fiction of Wong Bik Wan], (Hong Kong: Master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Wu Zhong Xian, *Da Zhi Wei Jing: Wu Zhong Xian Wen Ji* [Collected Works of Wu Zhong Xian] edited by Wu Ye Li Rong, (Hong Kong: Luck Win Books, 1997).

Yi Ding, *Lu Xun: Qi Ren, Qi Shi, Ji Qi Shi Dai* [Lu Xun: His People, His Affairs, and His Era], (Hong Kong: University Paris 7 Central De Publication Asia Orientale, 1978).